




· 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丛书 ·

戴震的文献学理论与 与实践成就

DAIZHEN DE WENXIANXUE LILUN
YU SHIJIAN CHENGJIU

石开玉◎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丛书 ·

戴震的文献学理论与 与实践成就



DAIZHEN DE WENXIANXUE LILUN
YU SHIJIAN CHENGJIU

石开玉◎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震的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成就 / 石开玉著.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676-2761-1

I. ①戴… II. ①石… III. ①文献学—研究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4297号

戴震的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成就

石开玉 著

责任编辑: 孙新文 崔龙健

装帧设计: 任 彤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69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76-2761-1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14年校级骨干教师项目(校人[2014]40号)成果

2015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招标项目

“戴震文献学理论与实践研究”(SK2015A044)成果

序 言

戴震，字东原、慎修，号杲溪，安徽休宁隆阜（今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清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二十四日生于一个徽州商人家庭。祖上均不仕，其父家贫，在江西南丰做小商贩。戴震少时很特别，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平日里勤于思考，尤其善于问问题。戴震十六岁时已通晓十三经，但因家贫、无以为业而随父亲去江西、福建一带经商，至十九岁时才回休宁。后多次去紫阳书院，得以结交程瑶田、金榜等人并师事江永，学业日有进步。三十一岁那年，戴震为躲避仇人迫害，只身逃往北京。在北京，他结识了纪昀、王鸣盛、姚鼐、钱大昕等著名学者。戴震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学术研究，以才学名重京师。1757年，戴震南下扬州，与惠栋相识，受其影响，他的学术思想发生转折。学术成就日益显著的戴震，仕途却十分坎坷，二十八岁中秀才，三十九岁才乡试中举，后六次去北京参加会试，均不及第。在此期间，戴震两次去山西修志。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十一岁的戴震因纪昀的推荐以举人身份被特召进入四库全书馆充任纂修官，从事校订、辑佚古书的工作，因校书有功，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戴震一直在四库全书馆工作，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二十七日死于任上。

戴震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思想家、考据大师、经学家、文献学家。清代考据学的启蒙期以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为代表。考据学全盛于乾嘉时期，分成三派，吴派擅长经史，以惠栋、钱大昕、王鸣盛为代表；皖派擅长经学、小学，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浙东派以史学为主，主要代表有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

戴震的治学范围宽广，是通才式的学者，其一生治学涉及哲学、文字、音韵、训诂、史地、天算、方志、谱牒、教育、美学等领域。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但哲



学只是戴学中的一部分，且不是主导方面，经学才始终是他治学的中心与主导方面。经学虽然只是对几部儒家典籍进行解释、阐述和议论，但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自汉代以来许多思想家借以明志载道的主要形式。戴震作为思想家，也以明经得道为表现其思想的重要方式，这是他与许多考据学家如吴派学者不一致的地方。戴震治经学的突出贡献在于他用科学的方法治经、整理和考证古典文献。戴震对我国许多古籍都有深入的研究，在古文献的考证方法、文字、音韵、训诂、传注、辑佚、目录、校勘、辨伪、版本以及撰修方志、谱牒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为我国古文献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戴震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其一生著述繁富，主要有：

(1) 经学类：《诗补传》《毛郑诗考证》《杲溪诗经补注》《尚书义考》《考工记图》《尔雅文字考》《经雅》《屈原赋注》《方言疏证》《续方言》《仪礼考证》《转语二十章》《六书论》《声韵考》《声类表》，校定《水经注》《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大戴礼记》《仪礼集释》《仪礼释官》《仪礼识误》等等。

(2) 哲学类：《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孟子私淑录》《续言》《经考》《经考附录》《大学补注》《中庸补注》等等。

(3) 天文算学类：《策算》《勾股割圜记》《原象》《迎日推策记》《历问》《古历考》《续天文略》等等。

(4) 方志学类：《水地记》《金山志》《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等等。


另外，后人对戴震的著作进行整理汇编，最早是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左右，孔继涵刻戴震的十六种遗著成《戴氏遗书》《算经十书》，统称微波榭本。乾隆五十七年（1792），段玉裁编纂《戴东原集》，收录戴震论述音韵、六书、转注、义理等方面的单篇论文，有十二卷，世称经韵楼本。1936年，《安徽丛书》第六期刊印戴震的著作共二十二种，成《戴东原先生全集》。199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叶光立主编的《戴震全集》，共六册。1994—1997年，《戴震全书》由安徽省古籍出版规划委员会组织编订，张岱年任主编，杨应芹任副主编，由黄山书社出版。全书共有七册，前六册是正文，收入戴著三十六种，含《经雅》《毛诗补传》等十



二种未刊书稿及佚文，每册配有数幅图片；第七册为附录，收录从清中叶以来众多名家对戴震的研究成果，书末附有《戴震全书人名索引》，以便于检索。新编《戴震全书》是百年来较全、较好的本子，为戴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2010年，根据学术界近年对戴震研究的最新成果，由杨应芹、诸伟奇任主编，对《戴震全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修订，并由黄山书社再版，此次修订不仅增收了新发现的佚作，也剔除了误收的文字，从而使修订后再版的《戴震全书》成为研究戴震的最好、最全、最新的资料。

自戴离世后，研究戴震的学者层出不穷。其研究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研究戴震的哲学思想，大多肯定其唯物主义思想，如焦循的《申戴》（《雕菰楼集》卷七）、章炳麟的《释戴》（《文录》卷一）、梁启超的《戴东原哲学》（《饮冰室文集》卷四十）、胡适的《戴东原哲学》（《胡适文存》）、容肇祖的《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国学季刊》1925年第2卷第1号）等。另一类研究戴震的小学、文献学，如刘师培的《转注说》（《左庵集》亨册）、马裕藻的《戴东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国学季刊》1925年第2卷第2号）、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卷八至卷七十一、吴时英的《戴东原的诗学》（《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的《记中央图书馆所藏的直隶河渠书稿本》（《胡适手稿》第一集卷三）、钱穆的《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浙江大学科学报告》1934年第1卷第1期）、胡朴安的《戴震著述书目考》（《安徽丛书》第6期）、梁启超的《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饮冰室文集》卷四十）等。

新中国成立后，则侧重于从思想史、哲学史方面研究戴震。近年有方利山的《戴震研究综述》（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戴学纵横》（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回顾了从清中叶至今的戴学研究概况。据在中国知网的主题检索结果，至今涉及戴学研究的论文多达1000多篇，其中对戴震的哲学的研究论文占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而涉及戴震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则不太多，主要是几十篇论文和三本专著，包括李开的《戴震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戴震语文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二书，较全面地介绍了戴震在经学、史地、人文、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成就，尤其详尽地论述了戴震在古籍注释学、文字学、音韵学三方面的成就；徐道彬所著的《戴震考据学研究》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戴震考据学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版本、目录、辑佚诸方面的成就做了较深入地研究,并从中概括出戴震卓越的治学思想与治学方法,是有关研究戴震考据学成就的第一部专著。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本书的写作有很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使本书得以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但是,这些成果仅仅揭示出戴震文献学成就的一部分,尚未有专著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细致地阐述戴震在古文献学各个方面所做的贡献,故而本书力求深入细致而又全面系统地梳理出戴震在古文献学理论及其实践各个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本书的突破之处在于:

(1) 运用比较研究法、数量统计法等计量史学方法,一目了然地揭示出一些问题。

(2) 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出戴震在古文献的文字、音韵、训诂、传注、辑佚、目录、校勘、辨伪、版本及撰修方志、谱牒等实践方面的成就。

(3) 比较深入细致地总结出戴震行之有效的文献学理论和古文献考证方法,这些也是他终生遵循的治学思想,从而使我们知晓了戴震学术成就卓越不凡的内在缘由。

(4) 本书侧重于选取戴震文献实体的主要方面,即以经学文献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其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成就,从而充实了本书的主导性观点,即哲学只是戴震学术的一部分,且不是主导方面,其学术的主导方面是经学、文献学、考据学。

目 录

第一章 戴震的文献学理论	1
第一节 义理统率考证	2
一、义理第一,考据第二	2
二、以音、字通词,以词通道	7
第二节 具体考证方法	11
一、求真求是,本末兼察	11
二、不偏主一家,力主实证	17
三、学贵专精,巨细毕究	22
四、依据条理,合理按断	26
五、综合研究,旁通互证	29
六、兼收并蓄,持之以恒	33
第二章 戴震对古籍的校勘、辑佚与辨伪	38
第一节 戴震对古籍的校勘	38
一、戴震的文献校勘方法	38
二、戴震校勘的古文献	41
第二节 戴震对古籍的辑佚	50
一、辑纂算书七种	50
二、辑佚《仪礼》注疏三种和《大戴礼记》	54
三、其他古书的辑佚	56
第三节 戴震对古籍的辨伪	57



一、辨析《周髀算经》	57
二、辨析《九章算术》	58
三、考辨《孙子算经》	59
四、辨伪《数术记遗》	60
五、辨伪《古文尚书》	60
六、考辨《水经》	61
七、辨伪《小尔雅》	62
八、辨析《易·十翼》	63
九、考辨《方言》非伪书	64
十、考辨《大戴礼记》	66
十一、考辨天文类伪书	67

第三章 戴震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69

第一节 戴震在古文献语言解释学方面的成就69

一、戴震在文字学方面的成就	69
二、戴震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	73
三、戴震在文献训诂学方面的成就	79
四、戴震古文献语言解释学的主要原则	85

第二节 戴震在古文献传注学方面的成就91

一、撰写《尔雅文字考》与《经雅》	92
二、疏证《方言》	93
三、著《考工记图》	96
四、撰《屈原赋注》	98
五、考释《诗经》	101
六、传注《尚书》	103
七、传注《学礼篇》	104
八、对《易经》的考释	106



- 九、对《春秋》的传注106
- 十、其他传注文献108
- 十一、戴震在古文献传注学方面的特点109
- 第三节 戴震在古文献目录学方面的成就110
 - 一、撰《四库全书总目》天算类提要110
 - 二、撰写校书提要113
 - 三、其他目录学文章115
- 第四节 戴震在古文献版本学方面的成就120
 - 一、戴震在古籍版本学方面的思想与方法121
 - 二、戴震在古籍版本学方面的实践成就124
- 第四章 戴震在地方文献方面的成就132
 - 第一节 戴震的方志学成就132
 - 一、戴震在地方志撰修实践方面的成就132
 - 二、戴震的方志学理论135
 - 第二节 戴震在谱牒文献方面的成就144
 - 一、戴震在谱牒文献实体方面的成就144
 - 二、戴震所撰谱牒类文献的特点145
 - 三、戴震的谱牒学理论148
- 结 语151

第一章 戴震的文献学理论

梁启超在《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一文中说：“东原在学术史上所以能占特别重要位置者，专在研究法之发明。”^①此言甚是，戴震在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有许多对今天仍十分有裨益的研究方法与文献考证理论。

戴震自幼好读诗书。“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②戴震同郡洪榜在《戴先生行状》中指出其性格内向，大器晚成，十岁才会说话。段玉裁在所著的《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对此解释道：“盖聪明蕴蓄者深矣。”^③就在这一年（雍正十年，1732），戴震去学堂读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且读书特别勤奋，“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④。《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戴震从友人处借得此书后，“朝夕讽诵，旁推交勘读之，则尽得其古画、古义、古音声、古度数名物”^⑤。戴震后来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⑥少时的勤学苦读、博闻强记，为其日后治文献考证学，打下了坚实的经学功底。

考证，即考据，是研究语言、历史等学科的一种基础方法。当我们接触古文献时，由于语言文字的变迁和古文献载体自身的讹误，有些地方已很难理解。因此，必须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典章制度学等方面的知识来解释、考订或校勘其讹误，以通晓其原义，进而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取可信的材料，得出恰当的结论。有关这一做法的学问

① 梁启超全集：第7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179.

② 赵尔巽.清史稿：卷481[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198.

③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7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133.

④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7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133.

⑤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7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25.

⑥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7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134.



就叫考据学或考证学。

清代是我国古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开始改正宋、明考据学芜杂零乱、讹误甚多、任意更改古书、不成专门之学的弊病，而深入、精确地考证古书与古字、古韵。至乾嘉时期形成考据学高潮，学者们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古代经典做综合深入地分析，不臆断、不制造伪证，对古书和古代典制能纠正前人之误，得出较正确的认识。戴震即是其中一位中坚人物和巨擘，这与他毕生遵循的文献研究方法与考证理论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义理统率考证

一、义理第一，考据第二

传统的古文献学由考据、义理两大部分构成，其中考据学应为义理之学服务，专讲考据而不讲义理，则是“半截子”学问。戴震治文献学，总体上说是主张考据学为义理学服务，即义理第一，考据第二。然而，戴震在不同时期，对义理、考据的关系，却有不同的表述。

戴震最先倡议义理、考核、文章三分说。早年戴震曾有“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①的论说，主张义理、考据各有其源，两不相谋。戴震在早年（乾隆二十年，1755）给方希原写信时也曾表达了这一思想：“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之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将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②由此可知，戴震主张“以艺为末，以道为本”，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等虽有名于艺，然其文章之所以足以流传后世，正因为其不仅为艺，更因其中有本，其本即为道：“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

①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7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182.

②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6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373.

也’”^①。可见，戴震在此强调了道是文章的根本、文章的价值在于传道。

后来，戴震既反对“得其制数，失其义理”的汉学（汉儒），也反对“得其义理，失其制数”的宋学（宋儒），主张把义理之学与考核（制数）之学结合起来，从而主张义理、考据兼治。这是因为戴震认为汉、宋学者各得一失一，应该各打五十大板：“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②故而，对宋学固然不可以一味地盲从迷信，对汉学也不可以一味地尊崇固守，义理、考据之学应该兼治兼得。而对一般的词章之学，戴震则轻视之，认为其是艺而不是道。

戴震在见惠栋（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他对义理与考据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即反对研究文献只是为考据而考据，强调文献考据是为了揭示典籍中所蕴涵的义理。戴震在见惠栋八年之后的乾隆三十年（1765），撰写了《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以追思惠学，文中充满感情地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③由此可见，此处戴震所论显然同早年大不相同：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不再各有其源，义理存乎于典章制度，亦即考据乃义理之源，义理必从考据出。这反映了戴震重视考据之学，而以义理之学为最终目的的思想。故而自从戴震与惠栋相见于扬州之后，由考据进而上求义理则成了他一生追求不懈的目标。

因此，在清代中前期汉学方兴未艾的学术氛围之中，戴震却能保持清

①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6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373.

②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6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370.

③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6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497-498.





醒的头脑。面对当时诸多汉学家热衷于训诂、考据而相对轻视义理探索，从而缺乏理论思维治学风气的局面，戴震特别倡导训诂、考据与义理的结合，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仅仅为了训诂而训诂、不以求义理为宗旨，则训诂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实际应用价值。另一方面，求义理必须经由文字训诂之途，两者不可偏废。为纠偏补弊，戴震甚至更加强调义理的重要性，因而他将义理放在文章、考核学之首。

在《古经解诂序》中，戴震再一次强调了求义理与考据古代经典的关系，进而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文字、训诂等语言学方法对于从古经之中求义理的作用与意义，他说：“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①在这里，戴震明确地表示反对对古代经典只进行纯粹的考据而不探求义理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考据学者表达出某种不满，也是在对惠栋的后学余萧客等人进行委婉地规劝，所以戴震在文中进一步说：“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诂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②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考据学者，不反对义理，并着重强调了如何由考据探寻义理的方法，即将文字、词汇、语言看作是通向经典中圣人之道（义理）的台阶，舍此台阶，则无法探得古经中的义理。由此，戴震明确地将文字、词汇、典章制度、语言研究的价值及意义与探求义理的崇高的价值理想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清代学人对古圣贤之心志的认识获得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又指明了文字、词汇、典章制度、语言学的研究方向，避免这类研究重新陷入汉儒的支离破碎的纯考据之中。对于这一点，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回忆戴震曰：“始，玉裁闻先生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孰乎义理，而后能考

①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6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375.

②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6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376.

核，能文章。’玉裁窃以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①

正因为这样，戴震一方面批评丧失义理的文章，另一方面也批评忘却义理的经学。此即他在《答郑丈用牧书》中所说：“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掎击以自表襮，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故学难言也。”^②当时的文章学家、考据学家皆有追名逐利之心而无闻道之志，这是戴震将理学家、考据学家和文章学家一同加以批评的原因。可见戴震认为有本的文章才可以传至后世，所谓本，是指儒家之道（义理），而儒家之道存在于儒家的经典之中，故要从经典中求得义理，则必须要依赖考据才可。

可见，在戴震看来，义理最为重要，考据、词章只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这就使得戴震的考据学与众不同：“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③此段文字表明，戴震的考据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考据学、训诂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揭示传统经典中的义理，即根本目的是为了闻道。

戴震十七岁时即有志闻道，至其晚年，终于构建了自己的义理体系，此体系以《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为标志，而《孟子私淑录》《绪言》分别是《孟子字义疏证》的一稿、二稿。戴震阐发义理的哲学著作，是他治考据之学的最终目的。戴震借助对《孟子》的再次注释（主要见于《孟子字义疏证》），重新解释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等哲学范畴，在继承并尖锐批评程朱理学的同时，展示出自己的哲学思想。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回忆戴震曾说过：“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④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月二十四日，戴震在给段玉裁的信中说：

① 杨应芹，诸伟奇. 戴震全书：第7册[M]. 合肥：黄山书社，2010：228-229.

② 杨应芹，诸伟奇. 戴震全书：第6册[M]. 合肥：黄山书社，2010：372.

③ 杨应芹，诸伟奇. 戴震全书：第6册[M]. 合肥：黄山书社，2010：531.

④ 杨应芹，诸伟奇. 戴震全书：第7册[M]. 合肥：黄山书社，2010：229.





“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①由此可知，戴震将其义理巨著《孟子字义疏证》视作“轿中人”，其他诸如文字、音韵、训诂、算学、天文、地理等著作皆视为“轿夫”，而轿夫是为轿中人服务的。也就是说，戴震一生之所以要治文字、音韵、训诂、算学、天文、地理等等学问，都是为构建他的“正人心”的义理之学服务的。

戴震有志闻道，就是立志寻求自然和社会的真理，旨在寻求裨益民生、经世济民的治世之道。他与那些为逃避文字狱而钻故纸堆的人不同，与那些一味迷信汉儒，为经学而经学、为史而史的人不同，也与那些反对广读经史、考订群书的人不同，戴震一再强调：“君子于书，惧其不博也；既博矣，惧其不审也；既博且审矣，惧其不闻道也。”^②戴震博览群书、广征博引，但不株守先儒，他实事求是而不偏主一家，他空所依傍而更志存闻道；他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与经籍的考据、训诂，是为了反对程朱理学的以理杀人、是为了阐明经世致用的道理、是为了建构新的文化与哲学；他重视治经、精于考证，但他闻道的舟楫和阶梯，只是其明义理的一种手段而已，而只有明义理才能改变“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③的封建社会悲惨现状，这对清末以来革命者的反封建斗争起着积极的鼓动作用。由此可见，戴震重视传统典籍的整理、古籍的研究，其目的是志在闻道、探求义理，而考据是为其义理服务的，也即戴震遵守“义理第一，考据第二”的治学方法论。

戴震之学的主要特色，在于自始至终主张由考据而进推义理，并将考据与义理结合起来，这也是不同于惠栋之学的主要之处。戴震探索义理之学的主要方法，是力图将义理建立在考据之上，通过考据而求义理，这是对宋、明学者空谈义理的否定，也是他的考据服务于义理思想的印证。戴震在《原善》开篇就说：“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而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类合义，灿然端委毕著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④此段文字说

①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6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533.

②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6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387.

③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6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479.

④ 杨应芹，诸伟奇.戴震全书：第6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0：7.